

● 杨 钟 郭建华 译



我的三个明星妻子

● 法国著名电影剧作家兼导演罗杰·瓦迪姆先生的自传

译林出版社

我的三个明星妻子

我的三个明星妻子

(法国) 罗杰·瓦迪姆 著

杨 钟 郭建华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25插页2 字数225,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58-7

I · 18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作者瓦迪姆是蜚声世界影坛的法国“新浪潮”电影剧作家兼导演。他编导的几部影片曾因“富有性感”而引起评论界广泛争论。他的两任妻子碧姬·巴铎、简·芳达及一任非正式妻子卡特琳·德诺芙恰恰都是红极一时的国际大明星。

在法国，碧姬·巴铎(简称B. B.)几乎家喻户晓，到处可见模仿“B. B.”修饰打扮的姑娘，她的活动常常成为法国人热门的新闻，被誉为法国“最优雅的女性”。

卡特琳·德诺芙主演的影片《最后一班地铁》曾荣获1981年法国电影凯撒奖的十项大奖，她本人也获得最佳女演员奖。1988年，巴黎当局选出德诺芙的雕像作为法兰西的新象征。

简·芳达是美国著名好莱坞女影星，曾多次荣获奥斯卡奖或被提名，由于她热衷政治活动，与瓦迪姆志趣不合，分居三年后离婚。

这部纪实性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先后与这几个女星结识、合作拍片、热恋、结婚、离婚以及离婚后的来往的全过程，交织着事业上的追求与爱情的甜酸，富有生活气息，充满浪漫色彩，堪称一部不上银幕的现代西方影人的生活传奇。

作 者 的 话

发表一部日记或者回忆录，并非是当代才有的新鲜事。作家、政治家、哲学家，乃至男女圣徒，都写过有关自己的家庭、爱情以及自己认识的人们的文字，这已有几千年的传统了。但触及“私生活”的某些领域，则是近来才有的事情。

然而，“私生活”的含义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显而易见，比如说，一个喜剧女演员，为了求得事业上的成功，不惜大谈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情感，以及自己的职业，以引起大众传播媒介的注意，恨不得借助银幕和照片，将自己的全部魅力公诸社会，待达到荣誉顶峰时，却又一反常态，竟要人们把已经说过或写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就像在萨伏那洛拉^①时代，不是查禁就是焚毁。

现在的一个明星休想指望过与世隔绝的隐私生活。若不通过舞台、银幕和舆论反响成名，则要考虑另谋出路，倘若真诚希望保守生活秘密的话。

自然也有例外。嘉宝就是突出的一例。但她的隐居生活笼罩着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的阴影，在她一生中，过生日也罢，亲人或私人有重大事情也罢，没有找新闻记者上门拍照。

我有意发表这部书绝不是为了耸人听闻（上帝可以为我作证，我并不缺这方面的材料！），相反，是为了向了不起的女人们表示温馨的敬意。

罗杰·瓦迪姆

目 录

| | |
|------------------|-----|
| 作者的话..... | 1 |
| 第一部 碧姬·巴铎..... | 1 |
| 第二部 卡特琳·德诺芙..... | 149 |
| 第三部 简·芳达..... | 205 |
| 第四部 与明星们对话..... | 301 |
| 尾 声..... | 323 |

第一部

碧姬·巴铎

1944

1945

自从波堤切利^①画了他那漂浮在珍珠上的维纳斯女神之后，人们就再也没见过破浪而出的爱神了。

然而，1953年5月12日11时30分，停泊在戛纳锚地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上，2000名美国水兵却饱览了这一奇迹。

他们首先发现水面上漂浮着的满头长发，接着看见她满面淋漓，晶莹的水珠犹如颗颗宝石在阳光下闪烁生辉。天真无邪的嘴巴富有性感，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妙不可言，鼻子娇嫩精美，两颊仍保持着童年的圆胖，既逗笑又讨人爱。只见她伸出优雅的双手，一把抓住小艇的边沿，上船时从头到脚脱水而出。天鹅般的脖子，圆嫩娇美的香肩，慷慨大方的乳房，腰身纤细，可以让一个男子双掌环抱，圆溜溜的屁股刚柔相济，富有挑衅性，神话中的美少年阿多尼斯和爱与美女神阿佛罗狄忒恐怕都会羡慕和嫉妒；腰肢曲线优美，大腿肌肉细长而有劲，腿肚子富于诱惑力，还有一双女舞蹈演员弓形的灵巧脚丫子。一件比基尼泳装，一道披衣阴影，岂能遮掩住这富于性感而又可以自豪的身体。

“企业号”上的水兵若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真会把她当作女神下凡。他们吹口哨，鼓掌，欢呼声在电影宫的台阶上都可以听得到。他们一窝蜂涌向左舷舷墙，争先恐后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① 波堤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作品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碧姬·巴铎，站在汽艇上，放声大笑。“他们快把航空母舰倾倒了！”她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一位军官从舷梯下来，示意碧姬上舰。这是违反军纪的舰上禁止聚众闹事或玩笑取闹，但他宁可明知故犯。

碧姬生性我行我素，欣然接受了军官的邀请。

一上甲板，她便同水兵们一一握手，她那几句英语说得大家哄然大笑，只要崇拜者要求，她便与他们照相留念。水兵们过去一般喜欢欣赏好莱坞半裸体明星照片，这一下纷纷改变了收藏对象。

碧姬离开航空母舰时，已经成了2000官兵的朋友。在上卡尔东之前，她穿上了自己的蓝布工装裤。从海滨到旅馆有好几百米，她得走半个多小时，但万万没想到穿过门厅也用了半个多小时，她终于冲进电梯，但另一批记者早已在四楼的楼道上等她。她的房间就在四楼上。

戛纳电影节正处在高潮之中。正是狂欢的时候。电影女明星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被派到地上来像救世主那样为人类引路，而记者们也不按照她们的社会活动或政治倾向评判她们的才能。碧姬·巴铎虽拍过几部电影，但她还不是明星，没有受到电影节评委会的邀请。她是陪她的丈夫来戛纳的。她的丈夫是《巴黎竞赛画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叫罗杰·瓦迪姆……

碧姬同我结婚才四个月，她不想一个人呆在巴黎。

虽然碧姬讨厌出席正式的招待会和新闻报告会，事实上她也没有一部电影入选参赛，但自从我们到卡尔东那天晚上开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摄影记者们放弃了他们平时追逐的猎物——国际男女明星，而掉转头来围追碧姬了。人们到处跟踪她，饭店里，海滩上，商店里，甚至到我们的房间里来。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在电影宫的报告厅里，只有几个记者在采访洛洛布里吉达、金·诺瓦克、柯克·道格拉斯，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其他的记者则跟着我妻子不放，从昂蒂布街的小店一直跟到克鲁瓦泽特的棕榈树下。

“巴铎现象”，一个18岁的姑娘对大众传播媒介这种难以令人置信的吸引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那年是在戛纳电影节上，闹出了一个国际性的“巴铎热”。

她参观“企业号”航母的当晚，我们同几个朋友在纳普尔的一家小客店里吃晚餐。我们终于甩掉了摄影记者的追踪（说来也怪，一个记者竟躲开自己的同行……），此时，一个男人走近我们的饭桌，自我介绍是奥纳西的特别秘书。

“您怎么找到我的？”碧姬问。

“我是从来不亮底的，小姐。事关原则问题。”

“您的老板很善于组织嘛。”碧姬指出。

“可以这么说，不错。他让我前来邀请您，明天晚上他在‘克里斯蒂纳号’客轮上举办招待会。电影节的所有明星都将光临。奥纳西先生让我转告您，若没有您的到场，晚会很难说是真正成功的。”

“他言之有理，”碧姬说，“可惜明晚我已有安排。我同我丈夫一起共进晚餐。”

看着秘书转向我对我发出邀请，她便补充道：“两人单独吃。”

人们从碧姬身上看到了美和勾人魂魄的性感。她张扬了过去一个时代的美色主义和生活的欢乐。但人们却很少知道她的苦恼，她的恐惧，她的不幸的天资，这种天资几次差一点将她引向悲剧的边缘。

在明亮的月光下互相拥抱，一起散步的恋人是想不到地

球卫星的另一面，永远见不到太阳的另一面的。对碧姬也一样，人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在最后一个性象征的光彩的形象后面，事实上还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92路公共汽车沿保罗·杜梅林荫道往布洛涅林园开去。10月的头两星期天气阴沉，但那天早上却突然变暖。秋阳露面，向巴黎献出最美丽的阳光。风和日丽，层林尽染。碧姬站在公共汽车的站台上，在大书包里乱翻着什么，书包里塞满了紧身舞服、芭蕾舞鞋、练习本和课本，嘴里不住地骂道：“见鬼，见鬼，见鬼……”这时她刚15岁。

男售票员欣赏着她那迷人的身材。

“丢了什么东西吗，我的少奶奶？”

“我的代数课本没了。很可能是在鲍里斯家里换衣服时掏出来的。”

售票员很羡慕这个鲍里斯。他万万没想到，鲍里斯·克纳季也夫，尼古拉二世沙皇宫廷的芭蕾舞大师，竟会是这个迷人的小姑娘的舞蹈老师。每星期三次，中学下课后，她去皮加尔广场的瓦尔克尔练功房，在天才的暴君家里。精采！姿势！旋转！击脚跳！击打跃步！……一、二、三、抬头！大跳，踮脚半旋转……第一次试演后，鲍里斯说：“好。但要用功！”这话很明白，意思是说：“你将成为舞蹈明星。”

碧姬在米埃特广场下了车，迈着轻快的步子，一直走到蓬

普街1号乙。旧式的液压电梯简直像一朵金属蘑菇沿着柱子往上窜。她在电梯里正挖空心思，想找个万全之策来说服自己的父母答应自己同一个女同学一起去看电影。不觉到了六层，也就是大楼的最高一层，她走出了电梯，打了三下短促的门铃。女佣出来为她开了门。

在客厅里，一个意外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她的母亲正在同《她》杂志的主编埃莱娜·拉扎雷夫谈话。埃莱娜正在寻找一张新鲜的面貌，用以表现现代法兰西少女的风采。她是巴铎夫人的朋友，所以认识碧姬。“是她，我告诉你。就是她。”当年轻的姑娘进屋时，她一再这么说。巴铎夫人，昵称“多蒂”，看不起报纸和广告。但为了不使埃莱娜扫兴，她终于同意了，“但不能让碧姬误了功课。”她具体要求说。

当时，我住在达尼埃尔·德洛尔姆和达尼埃尔·热兰家里，这对年轻的夫妇是法国电影明星。我有时候为他们看管孩子。他们的儿子才3岁。我适合当临时保姆，因为我向来喜欢孩子。在浴室里玩了一阵子后，举起手枪朝瓦格拉姆大街上的行人射击，接着又把一个床罩剪成一件罗马时代的长袍，之后我同扎齐再也想不出什么新招玩了。

“给我做一架飞机。”他说。

我从最新一期《她》杂志上撕下一页，对角一折，一个面孔引起我的注意。扎齐等着玩飞机，急了。

“你干什么呀？”

“我看一张照片。”

扎齐从我手上夺走那一页纸。

“我不认得她。可她长得很美丽。”他说。

碧姬当时长着深褐色头发。同人们经常写的那些文字相反，我对金发女郎从来没有偏爱过，是美貌打动了我。碧姬虽

然满头褐发，但她同样很漂亮。

第二天，我把那份杂志拿去给马克·阿莱格雷看。他决定导演我的处女作《收获光荣》。他很快就被我说服了，她不正是我的故事主人公的化身吗？他马上给巴铎夫妇写了一封快信，表示想见见他们的女儿，试一试镜头看看。

战后才五年，年轻的导演们尚无资格涉足影坛。马塞尔·卡尔内、罗内·克莱尔、亨利-乔治·克卢佐、勒内·克莱蒙、让·勒努瓦、朱丽安·迪维维埃和马克·阿莱格雷等统治着法兰西影坛（平均年龄将近50岁）。马克因发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影星而蜚声饮誉。他有慧眼识良才的独特天资。

我三年前就认识他了。我当时在他的一部名叫《珀特吕斯》的影片里充当群众演员，但他突然不得不离开摄影棚，因为她女儿在学校里出了个小事故。我当时正在摄影棚的院子里，眼看着他上了车，一溜烟跑了。我回到平台，只见制片人在那里咬着指甲干着急。那一天，时间的代价是昂贵的：拍一场市集场面有300名群众演员在场。我走向可怜的制片人，对他说，马克·阿莱格雷指导过我如何拍下一场戏。制片人万万没料到，一个17岁的小伙子，竟然有胆量自告奋勇执导一场复杂的戏，镜头又是推又是拉，骑着旋转木马拍全景，最后对准电影明星费尔南代尔来个特写镜头。他相信我了。

于是全班人马按我的“方案”各就各位，再来一次，只消两个小时，全场戏尽收镜头里。当阿莱格雷回到摄影平台时，制片人对他感恩不尽。“我知道当父亲的滋味。您走时就不必留下指示……”我松下劲来准备溜之大吉，但阿莱格雷非但没生气，反倒顺水推舟。他眯缝着眼角观察着我，拍完之后，他把我召到他的导演室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

“方案不错，”他说，“从马头转向费尔南代尔，这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主意。我没想到这一点。您有空陪我吃晚餐吗？”他补充说。

马克·阿莱格雷很快成了我的良师，我的益友（在某些如果可称之为“棘手”的问题上简直成了我的同谋），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的第三个父亲。我的生父伊戈尔·普列米扬尼科夫，法国领事，34岁猝死于心脏病发作。我的养父热拉尔·昂宁，城市建筑师，柯比西埃的合作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比我母亲小10岁，他对我的智力有很大影响。我欣赏他，喜欢他，把他当作我的兄长。遗憾的是，他最近同我母亲离了婚。虽然我独往独来惯了（从15岁开始我就展开自己的双翅飞翔），但当我路上碰见马克时，难免产生失去爸爸的苦恼。

那是在伦敦，为亚历山大·柯尔达拍一部片子，名叫《白女人菲丽》，与瓦莱里·霍布森和斯图尔特·格兰杰合作，我当时学着干副导演的营生。英国工会蛮不讲理，大搞孤立主义，因此，我得不到报酬。我对此倒不在乎。我住在导演的套间里，学习英语，熟悉英国人，尤其要熟悉英国女人。

过了一年（还在伦敦），我同马克拍一部侦探片，名叫《敲诈勒索》。每天夜里甚至通宵达旦在哈默施米特摄影棚里，每场戏都要重写。还有一个配角有待分配。马克把我拉到一家私营俱乐部去——在伦敦一切都是私人的——看一个年轻姑娘表演节目，她穿着泳衣，银光闪闪，脊背下部贴着三枚鸵鸟毛作装饰。她很迷人，表演幽默而富有魅力。“她演波利妙极了，”马克对我说。几个星期里，他为起用她而奋斗。制片商是一个正直的人，说什么也不肯听，我宽大为怀不点他的名。“她已经试了三次，没人要。她的鼻子太讨厌。这姑娘不在行。”然而这“姑娘”就是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大明星奥戴丽·赫本。

后来，出钱拍这部电影的一个财东的情妇把这个角色带走了。

回到法国后，我写完了我的剧本《收获光荣》。故事里的主要角色没有一个是成年人。在当时，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在25至50岁之间。年轻人的电影还没有引起兴趣。但阿莱格雷同意为我的剧本执导后，一个制片商花八万（旧）法郎买下我的故事。使我感到荣幸的既不是荣誉，也不是财富，而是一家报纸，《电影世界》，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罗杰·瓦迪姆，19岁，欧洲最年轻的电影剧作家》。

在伦敦至巴黎的列车上，马克和我遇见了巴黎芭蕾舞最有天才的舞星李丝丽·卡依。他让她试片作我的剧本的主角。制片商不干。“她像一个爱斯基摩人，”这就是他的裁决。但这一次试镜头，却使李丝丽上了《巴黎竞赛画报》的封面，而吉恩·凯利约她拍他的电影《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我对李丝丽温情脉脉，而她，对我则体贴入微。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度过了三个星期的假期，进行冬季体育锻炼。我们在爱情的细钢丝上求得平衡，不论是她还是我，都不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嘛，感到羞怯，而她呢，与巴黎芭蕾舞团的一个男舞星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感情上一时还没有恢复过来。在梅热瓦的勃朗峰旅馆，我们同住在一间房子里（主要是为了省钱）。李丝丽在地上铺一块床垫，席地而睡。她纵容了一个男人的感情，又在他的房间里过夜，却不同他作爱，她感到罪过，于是索性不睡舒适的软床，躲开我，独自进行禁欲主义修行。她像战前的女影星那样，戴上黑绒眼罩睡觉。

李丝丽在好莱坞准备拍《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过了几个月后，她感到孤独。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是这样结尾的：

你为什么不来这里？你可以在这里安静地写作。我相信你的剧本构思会有市场。知道你离我这么遥远心里就感到忧

伤——越想越难受……

若不是在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件，我无疑会欣然接受她的邀请的。大约在收到她的回信的前一个月，我遇到了碧姬·巴铎。我现在才知道，我对李丝丽流露出的温情、友谊和肉体上的吸引力（其实我们只是互相拥抱接吻而已）并不是爱情。

老巴铎夫妇为自己的女儿的前程着想（与一个银行家，或一个工业家，必要时与一位部长结婚），他们在给马克·阿莱格雷的回信中，所提供的机会小得可怜。但由于巴铎夫人对女儿的谋职试演没认真对待，而且也出于好奇，想认识一位影坛名流，于是在女儿的一再要求下让步了。她心想，这次会面也许一事无成，那时碧姬就不好放下脸来责怪父母了。会面约在马克·阿莱格雷的家里，洛尔-比龙街 11 号乙，放学以后，吃晚饭以前。

碧姬压根儿就没指望能跻身影坛拍电影。再说，她也不想拍电影，而是想继续她的古典芭蕾舞事业。但她倒是一直想结识一些人，改变一下朋友结构，在蓬普街接待的除了爸爸妈妈的朋友外，就是出身高贵的中学同学了。她像她母亲，很想结识一个在明星或名流世界举足轻重的男人。

不论是多蒂，还是巴铎小姐都没有料到，这次走访扰乱了他们生活的流程。

3

我见到碧姬，她身上令我动心的，用一句舞蹈行话来说，